



布鲁门贝格的 诗学与解释学研究

——以《神话研究》为中心

李包靖 著

Poetik und Hermeneutik bei
Hans Blumenberg

Eine Studie zur *Arbeit am Mytho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
(批准号:09YJC751067)

布鲁门贝格的诗学 与解释学研究

——以《神话研究》为中心

李包靖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以《神话研究》
为中心 / 李包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308-16678-2

I .①布… II .①李… III .①神话—诗学—研究
②神话—阐释学—研究 IV .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5980 号

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

——以《神话研究》为中心

李包靖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周晓竹 张小苹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16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78-2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时代隐匿的思想家·····	(1)
第一节	生平简介·····	(1)
第二节	主要著作的思想概貌·····	(4)
第二章	“神话创作”的诗学研究·····	(29)
第一节	逻各斯和神话关系·····	(30)
第二节	证成审美神话·····	(41)
第三节	人类文明审美化道路之寓言 ——以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为例的述评·····	(60)
第四节	神话的诗学性·····	(77)
第五节	神话的讲述以及重新讲述·····	(89)
第六节	作为现代诗学的神话创作 ——以浮士德神话创作为例·····	(104)
第三章	“神话研究”的解释学研究·····	(126)
第一节	开端与终结视野下的神话研究(上)·····	(127)
第二节	神话的反转权能·····	(142)

2 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

第三节	反思审美神话·····	(157)
第四节	作为神话研究的意义生产(下)·····	(180)
第五节	作为圆形思维的神话研究·····	(198)
第六节	解释学的命运·····	(217)
第四章	神话解释学对接受美学的批判——以尧斯为例·····	(258)
第一节	布鲁门贝格和尧斯之争·····	(258)
第二节	问答解释学和功能占据说之辩·····	(270)
第五章	诗学与解释学完美融合·····	(283)
第一节	伟大诗人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	(283)
第二节	一个不是结语的结语·····	(335)
参考文献	·····	(344)
索 引	·····	(356)

第一章 我们时代隐匿的思想家

第一节 生平简介

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一译为布卢门贝格,1920—1996)是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位思想巨匠。在德国群星闪耀的知识界,他是这样一颗恒星,因距离我们过于遥远,其璀璨的星光掩敛于群星的荣光之中。在世人皆息、万籁俱寂、良夜悠悠之时,他却如孤星闪耀,独照寒秋。这位与哈贝马斯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生前没有享受与其成就相符的赫赫声名,只是默默地在学院里度过他授业、著述的一生。

在当年接受美学的热潮中,我们通过接受美学领袖人物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的自叙^①初步了解到,布鲁门贝格是搞文艺出身的,是德国吉森大学“诗学和解释学”研究小组的执牛耳人物。尧斯就是从这个“过去二十年中最令人愉快的学术事业”^②中汲取了足够的理论营养,为他开创“康斯坦茨”学派奠定了基础。尧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如日中天,闪闪照耀全球,人们称之实现了一场“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那么,布鲁门贝格干吗去了呢?原来这位思想大家不习惯于学术明星秀,有意无意地与现代媒体保持距离。

翻开布鲁门贝格的简历,是简单而平静的一生。1920年7月13日,

^{①②} 汉斯·罗伯特·尧斯:《我的祸福史或: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林必果译,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他出生于吕贝克。最初,他在帕德博恩和圣·格奥艮等地学习哲学和神学。后来,由于纳粹上台被迫中断学业。纳粹垮台后,他先后在汉堡和基尔等地继续完成学业。1947年,布鲁门贝格获博士学位,1950年,他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先后在汉堡、吉森和波鸿等地从教。1963年,布鲁门贝格当选为美因茨科学和文学研究院院士。1970年起,他在明斯特大学担任教授职位,1996年终老于此地。

编年体式人生履历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孤寂和思想的沉闷。相反,布鲁门贝格的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和他独特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隐居高等学府,一生淡泊名利。生前,布鲁门贝格曾获两项荣誉:一次是海德堡大学颁发的“库诺·菲舍尔奖”(1974),另一次为德国语言与文学研究院授予的“弗洛伊德奖”(1980)。此外,为了表彰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吉森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82)。与当今知识分子热衷于媒体作秀的姿态相比,布鲁门贝格无疑有他独到的学术批判立场。这种学术人生的选择有益于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

布鲁门贝格的学术气象万千,构思宏大。他一生敏于思索,勤于著述。生前生后共发表了各类文章近200篇,论著达20种之多,且不乏卷帙浩繁的巨著。下面所列的布鲁门贝格主要著作的年表体现了其不间断的沉思,其思想风格亦可见一斑:

- 1.《哥白尼转折》(*Die Kopernikanische Wende*, Suhrkamp, 1965);
- 2.《现代的正当性》(*Legitimität der Neuzeit*, Suhrkamp, 1966);
- 3.《哥白尼世界的起源》(*Die Genese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 Suhrkamp, 1975);
- 4.《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 Suhrkamp, 1979);
- 5.《世界的解释》(一译为《世界的可读性》)(*Die Lesbarkeit der Welt*, Suhrkamp, 1981);

- 6.《生命时间与世界时间》(*Lebenzeit und Weltszeit*, Suhrkamp, 1986);
- 7.《马太受难曲》(*Matthaeuspassion*, Suhrkamp, 1988);
- 8.《走近洞穴》(*Höhlensgänge*, Suhrkamp, 1989);
- 9.《天上的星星》(*Die Vollzähligkeit der Sterne*, Suhrkamp, 1997);
- 10.《从历史中生成的概念》(*Begriffe in Geschichten*, Suhrkamp, 1998);
- 11.《以歌德为例》(*Goethe zum Beispiel*, Suhrkamp, 1999);
- 12.《容易上当的哲学家》(*Die Verführbarkeit des Philosophen*, Suhrkamp, 2000);
- 13.《雄狮们》(*Loewen*, Suhrkamp, 2001);
- 14.《美学与隐喻文集》(*Ae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Suhrkamp, 2001);
- 15.《面向事情与回避事情》(*Zu den Sacher und zurueck*, Suhrkamp, 2002)。①

从上述列举的书目可以看出,布鲁门贝格的思想踪迹抵达人类文化创造的方方面面,从哲学到历史学,从人类学到神学,从音乐学到美学,等等。此外,布鲁门贝格曾参与撰写德国著名的神学百科全书 RGG 词条,在神学方面造诣颇深,且不说《现代的正当性》的神学部分,后来的《马太受难曲》无论在思想还是审美风格方面,均堪称神学的“凌云健笔”。人们交口称誉他的隐喻式写作风格:“将来我们说到国内杰出作家时,不可能不提到布卢门贝格的名字。他的创作集杂文、笔记、哲学叙事于一体,一

① 曹卫东:《布卢门贝格:人类此在关系的解释者》,《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1期,第43—44页。(以上有关布鲁门贝格的生平和著作资料采自《布卢门贝格:人类此在关系的解释者》一文,特此致谢。)

言以蔽之,他所创作的是绵延不绝的世界历史幻灭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足以与博尔赫斯的讽刺散文媲美。”^①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称布鲁门贝格的《世界的可读性》(或译为《世界的解释》)为“一本奇妙的书”^②,并不吝溢美之词。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德国思想的重新引介和再度思考,布鲁门贝格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关于现代合法性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凭着这些零星文章的介绍,我们得以管窥布鲁门贝格的现代性理论。《现代的正当性》一书是布鲁门贝格的成名作,现已成为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经典。若干年后推出的《神话研究》,一举澄清了他那迥异于接受美学的学术旨趣。反观汉语学界或是欧美学界,他们热烈地拥抱“康斯坦茨”学派,冷落了布鲁门贝格的神话解释学。这种颇成问题的“接受”对于布鲁门贝格来说是不公平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奇怪,学术界毕竟不是人来人往的浮华之地。

据统计,2000年德国著名的苏卡普(Suhkamp)出版社旗下出版的12711种图书中,思想家布鲁门贝格的著作已被译为12种外语之多。^③由此观之,汉语学界对于布鲁门贝格思想著作的“接受”显然准备不足。因此,介绍和引入布鲁门贝格别具一格的诗学和解释学,有利于校正早先在汉语学界流行的接受美学的薄弱之处。

第二节 主要著作的思想概貌

在漫长而充满激变的西方思想史上,布鲁门贝格是一位坚韧不拔、长途跋涉的旅人。每一段漫长的路程,都是一方波澜壮阔的风景,那是对旅

① [德]希尔马赫:《最后的词语面前的笑:论汉斯·布卢门贝格〈无尽的忧〉》,转引自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② [意]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③ 曹卫东:《苏卡普和他的出版文化》;《雪落美因河》,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5页。

人最好的报答和馈赠。以下拟从三种不同的思想形象和理论角色来勾勒这位永远在路上跋涉的思想家素描。

一、现代正当性之奠基者

综观西方现代性理论著述,真正试图从根本上澄清现代与中世纪乃至整个前现代关系,进而为现代奠定正当性之基础者,应当首推布鲁门贝格的成名作《现代的正当性》。

布鲁门贝格从批判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经典命题着手,即所谓现代的正当性在于它的世俗化。自17世纪以来,人们变得如此专注于安全和生存,对匮乏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对一切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包括资本、技术等因素)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总之,人们变得越来越“世俗”,而对一种宇宙秩序、一种神意与来世得到拯救的应许却日渐淡漠,乃至遗忘。大多数专家据此认为现代是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布鲁门贝格却认为这样的“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是一项“历史的非法范畴”,因为推崇世俗化论者否认了现代的正当性,他们认为世俗化使前现代神圣概念向世俗概念发生了转换,变成前现代的衍生物。其实,现代正当性并非求助于世俗化的充分合理性。原因可能是,尽管现代正当性概念彻底摆脱了上帝,摆脱了神圣,是一种“去魅”的意识形态,但是,现代自由意识的自我立法行为,却非法地挪用了中世纪神学体系“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叙事图式,以一种关注人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来替代或占据宗教的神圣的目的和需要。因此,布鲁门贝格把世俗化说成是一个历史的非法概念。

在“新时代”(die Neuzeit,现代)的本质属性和正当性问题的论述中,布鲁门贝格归纳出一种“人的自我捍卫”(humanne selbstbehauptung)的“生存筹划”——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性自我保存的肯定功能,它却不是一种自我授权(selbstermächtigung),“这种划时代的合理性只不过以一种自己并不理解的方式侵犯了神学;事实上,这种侵犯隐秘地从神学获得了一切。就理性所实现的东西而言,理性出于何种动机来完成这些,根本无关

紧要;但就理性所实现的东西而言,需要和挑战、争议和疑问的彻底性则不容忽视。自我捍卫(又译自我宣称)决定了理性的彻底性,而非理性的逻辑”^①。布鲁门贝格对自我捍卫的理性含义的诊断轰然回响着中世纪后期唯名论(nominalismus)的“神学绝对主义”(theologischer absolutismus)余音。人的自我捍卫与神圣的“彻底性”保持紧密联系,足以见出它的“根正苗红”。但历史往往充满着反讽的力量。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就是把它概括为一种“自我肯定、自我伸张”的“理性系统的意志统一体”。^②因为在他看来,人的自我捍卫导致其坚固的意志,把自身的各种意识聚集为化合状态,从而产生了现代社会原子式的个体。之后,它不幸地踏上了“理性被滥用为意志”之路,在现代思想史上掀起了一场自我捍卫的轩然大波。理性的彻底性虽不是理性的逻辑也不等于非理性的意志逻辑。如果像施米特那样把自我捍卫的现代理性误断为“意志的统一体”,简直是一笔抹杀了现代理性身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性遗产。

中世纪后期唯名论的“神学绝对主义”如何孕育出“人的自我捍卫”的反叛因素,而人的自我捍卫又是如何把“神学绝对主义”的神圣能量转化为自己的反抗动力呢?“神学绝对主义”把上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一个全称的量词——“全能”,赋予上帝无可限量的绝对权威和行动力量。但是,“神学绝对主义在人性意义上绝对是不可承受的”^③,也是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去理解的,因而对人构成了一种挑战和压迫。上帝意味着一切,那人就是一种虚无。此话怎讲?第一,因为按照奥卡姆(Ockham)的唯名论,上帝的全能表现在他拥有创造或毁灭他所意愿任何东西的绝对而无限的权力,而任何东西的是否存在的理由最终取决于上

① [德]布鲁门贝格:《〈政治的神学〉及其续编》,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② [德]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

③ [德]布鲁门贝格:《〈政治的神学〉及其续编》,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28页。

帝的意愿——如果因为他愿意(Quia voluit),那么,我们的事实上存在的有限世界就是彻底偶然性了,这种彻底偶然对人的存在来说就是一种虚无感。第二,如果把上帝推崇到绝对不可知的地步,实际上人在绝望中把上帝当成不可信任的存在,因而这样的上帝成为一位“隐匿的上帝”。人既然无法把握和接近上帝,那么,人必然就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和挑衅。这显然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的、正常的和理性的态度,因此人们诚心实意逃离神学绝对主义中人的自我牺牲,并决定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实现“人的自我捍卫”。被“神学绝对主义”逼入如此险境的现代人,在极端程度上,从挑衅超验绝对者的“启蒙者”突然反转为揭示内在绝对者(人)自身的“浪漫人”。现代历史上人与上帝的对峙,大大颠覆了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奇怪的是,自我捍卫的理性却因此具有了一种吊诡的历史意义:这种指向个体利益的启蒙会荡涤一切总体性神话,从而把自身逆转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于是,人对神的“哗变”由此导演了一出中世纪“秩序的丧失”的戏剧。

中世纪“秩序的丧失”标志着中世纪的衰落和现代的正式登场。现代的自我捍卫通过把人置于神的地位来建构一种能够对抗神学的唯意志论立场,因此,“人的自我捍卫”仿佛既是对上帝的一种挑衅行动,又好像是人重新模仿上帝建立起一种与人自身息息相关的秩序。布鲁门贝格是这样解释“神学绝对主义”与“人的自我捍卫”之间的内在逻辑的:现代性挪用全知、全能、全在的唯名论上帝,把人置于一个处处皆冷漠的世界,从而使人陷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不安之中,人不得不“反求诸己”,并决心捍卫自我的存在。因此,现代性是中世纪理性的合法嫡传,并非生来就是“解构神话化过程”。

自我捍卫的唯名论气息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过程中表露无遗。通常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主性的独立过程,是现代自我捍卫过程的一种典型表征。人的自我捍卫在反对上帝的整个过程中,凭借科学、进步等信念鼓动人认知外部世界,乃是面临“神学绝对主义”压迫的一项核心的生存筹划。推动人起而自我捍卫的动力正是布鲁

门贝格所谓的“理论的欲望”(theoretische neugierde, 一译为理论好奇心)。作为求知欲的“理论的欲望”,它“根本不需要辩护”,而且它更是“自我辩护”,并“以自己的明证性为根据”^①。论战对手施米特为布鲁门贝格的“理论的欲望”提供了一个语源学上绝佳的“自己的明证性”:“在这种问题的状况中,拉丁词 *curiositas* (新奇)作为求知欲的表达,希腊词 *tolma* 或许更准确些,因为它表达了因勇敢以及危险感到愉快,从而隐含着不需要辩护。”^②从奥古斯丁开始,中世纪基督教怀疑理论欲望会分散灵魂对上帝和拯救的首要兴趣。在布鲁门贝格看来,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历史就是“理论的欲望”兴起并逐步遭到压制的历史过程,但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对理论的欲望之看法又出现了物极必反的现象。在《观念史》(*Ideengeschichte*)中,他反复强调由晚期经院哲学所造成的概念僵化,不可避免地要激发对“理论欲望的解放”。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在死灰复燃的“理论的欲望”身上找到了关注自我和捍卫自我的基点。在培根指点下,人们开始关注外部世界(自然)。征服自然和捍卫自我的文化表征直接刺激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并在短时期内有了长足的进步。“理论的欲望”所造成的现代性恶果当然不能由“理论”负责。由此看来,自我捍卫的现代理性异常驳杂,并且光怪陆离,既掺和了容易被人误解为非理性的唯名论绝对主义,也确实含有非理性的“理论欲望”。

仅指出中世纪和现代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论证现代从中世纪发展出的合法性,这经不起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解的质疑与驳斥。况且,接下来的问题更为致命:既然现代与中世纪互为因果关系,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那么,它与古代具有怎样的关系呢?再进一步,如果把两者贯穿起来,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哲学的演化逻辑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布鲁门贝格思想最为卓越的一次发挥。他从雄浑的

①② [德]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532页。

神学知识背景出发,来审视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和另一秘传文化灵知主义(gnosticism,又译为诺斯替教)^①之间的张力。他认为,如果把中世纪和现代合观为一个整体以区别于古代,灵知主义的命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非完全”的范式。

“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的观点颇能代表古代精神。那么,“恶会从哪里来呢?”古代遗留下来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世间恶之根源的追问。发端于古代后期的灵知主义用一种神学的二元论来回答古希腊泛灵论思想遗产。回答者的思想并非天外来客,它完全可以在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找到胚芽。柏拉图的巨匠造物神相对于理念来说不是全能的,他所创造的世界隐含了恶的潜因。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呈现为理念模式的巨大过失,因此,理念的神学化必然伴随着物质的妖魔化。柏拉图的理念与造物神、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与物质的世界观诱发了一种全新类型的灵知主义形而上学:“它利用新柏拉图体系时,确实并非是该体系的结果,而是新柏拉图体系重新占据其位置。造物神成了恶事原则,成了只超越但并不参与世界创造的拯救神玩对手游戏的对手。”^②

在否定世界的基础上,灵知主义神学的二元论认为世界有此岸和彼岸之分,主宰它们的分别是创世之神和拯救之神。一位异在于此世、爱之上帝成为救世主,率先反对公义的上帝这个恶世的主人和造物主。这两个上帝即使并非处于相互激烈斗争的敌对关系,也难以回避一种不可化解的陌生关系和一种危险的冷战状态。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作为世间的存在物,人的精神和灵魂注定只能在这两个世界中轮回。由于是一

① 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又译为灵知主义,是一个现代术语,来源于希腊词 gnostikosm(即 knower,指一个拥有诺斯或秘密知识的人),长期以来用于表示2、3世纪的教父所批判的基督教的异端。到了18、19世纪,被认为是希腊化晚期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化过程中的一场大范围宗教运动。

② [德]布鲁门贝格:《克服灵知派的失败使其再生成为可能》,张宪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45页。根据原文略有改动,后文不再说明。

种否定性的世界观,灵知主义遭到了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首的正统神学对其第一次克服。在布鲁门贝格看来,第一次克服灵知派(尤其奥古斯丁的克服)失败之后,现代不得不进行对灵知派的第二次克服。至于第二次克服的成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说,灵知主义通过提供异在上帝的拯救的方式,有利于改善人在恶世之中的现实性地位的话,那么,现代的自我捍卫只是‘被改写’的灵知派遗产。”^①由此看来,基督教的中世纪及现代的自我捍卫“理性系统的统一体”,就可以理解成灵知派的对立立场的胜利。

“时代的变迁”是布鲁门贝格历史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通过透视世代之际春秋代易,我们不仅可以观察不同历史范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还能把握不同时代之间的精神变迁。但是,在历史纪元的变迁之下隐藏着一连串의连续性问题,库恩关于科学内部范式转换忽视了“认识过程本身”背后的连续性,因而时代变迁与库恩的范式转换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老盯着“学说”或“观念”,把它们看作是我们传统的填充物,而应学会把这些问题和人类的探索活动、提问活动关联在一起,并赋予他们相关性和具体意义。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关于整体世界的历史模式和意义问题,它表现为一个系统,在“一个系统性语境中存在诸多位置间的归属关系,这些位置就是共同拥有全称量词‘全能……’^②”这里的“位置(立场)”凭借历史的整体叙述因而具有全称量词“全能”的特征,秉有了“绝对主义”的能量。于是,这些系统语境中不同的全称量词的“位置”展开了“话语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 der Wörter)竞争。布鲁门贝格称这种历史哲学模式为一种功能化解释学模型,用以表述不同时代在精神价值变迁上的起承转合。他通过隐喻学(metaphorologie)形象地来说明这种解释模式:一个系统的原有观念之“位置”被后起观念“占据”(和“重新占据”)。

① [德]布鲁门贝格:《克服灵知派的失败使其再生成为可能》,张宪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54页。

② [德]布鲁门贝格:《〈政治的神学〉及其续编》,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34页。

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功能载体构成的隐喻系统,其中蕴藏着不同的问答的功能载体,一部分问答的功能载体消失了,空出了“位置”,随即便有新的问答的功能载体来填空和占据。所以,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遁隐和显现的动态过程。至于哪种观念占据这个位置,是由“所处的境况本身的需要来决定”。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出布鲁门贝格时代变迁的功能化解释学的雄心壮志,从整体的西方思想意识史出发,在这一巨大的不连续性背后寻找连续性,这样一个作为整体的理解过程势必把自笛卡儿以来被科学理性主义斥为非理性的东西(需要)包括进来。但是,他异常警惕这样相对主义的极端化思考方式:如果以需要的假设而不是以真理的论证来诠释时代变迁的精神价值时,这往往会在许多历史选择的关口,造成解释学上的悲剧现象。因此,布鲁门贝格要求我们在分析诸多历史个案^①时,应该承担更多的解释学“责任意识”,方可不会对问题进行派生化和程式化的处理。

按照此种历史哲学模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浪漫派和启蒙主义之间的“战争状态”。这里可以用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哲学关系来描述这种“重新占据”的功能化解释模式。由于唯名论坚持“语言而非独立的实在,成为已知相似性的基础”,所以,它可以借助于共相的普遍性或绝对主义形成一种机制化的表述:事物的殊相被虚无化了。这个时候,唯名论语言之“名”——语言程式——倒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观察方式。布鲁门贝格顺理成章地以此楔入他的历史哲学的架构之中。《圣经》解经学中有两条语言程式格外受布鲁门贝格青睐:一条是“Creatio ex nihilo”,一般把它翻译为“虚无的创造”,布鲁门贝格别出心裁地翻译为“从虚无中创造”;一条是“Peccator videbit, et irascetur”,通常译为“智慧始自敬畏主”,他出人意料地颠覆成“智慧始自主的敬畏”(此条的语言程式在《马太受难曲》

^① 例如,这些历史个案包括:早期的灵知主义二元论对古代泛神论的占据,中经奥古斯丁和大公教义对灵知主义的克服,至中世纪晚期现代理性在唯名论的神学绝对主义面前起而“自我捍卫”,等等。

中有详细的讨论)。

唯名论的语言之“名”在成为观察历史个案之精密仪器的同时,也容易沦为语言程式化的“机制”统治。实在论就是以真实的存在攻击唯名论这种殊相虚无化的“机制”统治。启蒙理性坚持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它大踏步地奔向各种乌托邦方案。一方面,启蒙的乐观主义乌托邦方案既是对基督教末世论(Eschatologie)“拯救故事”(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重新占据”;另一方面,启蒙的乌托邦方案是一种贫困的进步观念,它容易蜕变成为一种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抽象的“理性机制”。因此,“在启蒙的宏大批判之后,留下了某种所谓的设计,这种设计本身极度贫乏,从而为浪漫派留下了从虚无中创造的大好机遇”^①。问题是,浪漫派以什么样具体的实在论反对抽象的启蒙理性主义呢?当启蒙向前看的眼光转为浪漫派向后看时,浪漫派就“焦虑地替过去的精神招魂”,以“原初的启示”来反对启蒙的进步方案。于是,浪漫派一笔再笔地以“文化记忆”或传统来占据启蒙理性主义空缺的位置。在往昔,“虚无的创造”是基督教上帝的人身行动,现在浪漫派能够虚构地利用这一姿态,以“从虚无中创造”确立历史的连续性。“因此,对语言世俗化现象来说,关键并非在于以可以广泛证明的方式返回到诸如此类的神学,而是根据一种基于背景和激情的实际需要,对诸多要素进行选择。”^②从“虚无的创造”到“从虚无中创造”,目的无非是为历史观念和历史的解释开启诸多可能性条件,这个时候我们揭示的不是内容和观念,而是“使用隐喻的处境的特征”。^③布鲁门贝格据此批评施米特的“历史概念的意涵不是从虚无中创造,而是虚无的创造,

① [德]布鲁门贝格:《〈政治的神学〉及其续编》,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39页。

② [德]布鲁门贝格:《〈政治的神学〉及其续编》,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33页。

③ [德]布鲁门贝格:《〈政治的神学〉及其续编》,吴增定译,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134页。